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项目承担机构



洞 报

2011年第1期（总第23期）

本 期 目 录

中心大事记	(1)
科研活动	(3)
学术成果	(5)
学术交流	(9)
媒体传播	(14)



主 编：史晋川
执行主编：朱希伟

中心大事记

2011.1-2011.4

🌸 汪炜教授等入选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员 (2010 年度)

经学校选拔推荐,专家评审,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联席会议审批决定,接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同意王青青等 275 名同志入选 2010 年度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第一层次及第二层次培养人员的通知》(浙人社发〔2010〕382 号),我中心黄先海教授入选 2010 年度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员;汪炜教授入选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

🌸 中宣部致函感谢史晋川教授参与理论书籍的编写工作

2011 年 1 月 3 日,浙江大学收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发来的感谢函,表扬社会科学学部主任、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良好的工作作风和较高的理论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所承担的任务,为《读本》的编写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宣部理论局对浙江大学的大力支持和史晋川教授表示衷心感谢, 并请学校对史晋川教授给予表扬。张曦书记代表学校领导向史晋川教授表示感谢, 并请学校宣传部门对史晋川教授进行宣传和专访。

🌸 金祥荣教授研究成果受到省委书记赵洪祝等领导重要批示

2011 年 2 月, 由浙江省咨询委综合经济部牵头, 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等主持并执笔完成的省“十二五”规划专题研究课题《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近日受到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等省委领导的重要批示。

赵洪祝书记在批示中写道: “课题组对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了深入思考研究, 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 为促进我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德水副省长的批示为“《浙江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很有价值, 请有关同志认真阅研, 积极采纳。”

🌸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亲切慰问长广集团培训班学员

201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在 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的陪同下, 专程前往西溪校区看望、慰问长广集团培训班学员, 并和全体学员亲切交流。浙江长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新民代表全体学员向金书记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金书记首先向所有学员问好, 并与学员一起回顾了长广集团的发展历程, 充分肯定了在韩新民董事长的领导下长广集团近年来的发展成果, 并对韩新民董事长能够组织人员来浙江大学学习表示赞扬。金书记指示 CRPE 要认真配备浙江大学的一流师资, 集中优势为长广集团学员服务; 并勉励学员在浙江大学期间认真学习, 勤于思考, 相信在长广集团各位中高层领导人员的带领下, 长广集团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随后, 金书记在后排就座, 与韩新民董事长、金祥荣教授和黄华新教授一起与长广集团培训班全体学员亲切合影留念。

科研活动

科研基金项目立项

1、史晋川,“经济学部战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2.2。

2、黄先海,“浙江加快培育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对策研究”,浙江省社科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1-2012.1。

3、肖文,“浙江民营企业入岛投资研究”,浙江省政府部门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2.2。

4、蒋岳祥,“浙江居民保险消费需求研究”,其他政府部门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3-2011.12。

5、金祥荣,“长广集团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企事业委托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2.2。

6、金祥荣,“江苏黑牡丹-天宁科技园策划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2.2。

7、张自斌,“长广集团公司战略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2.2。

8、叶建亮,“长广集团公司战略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2.2。

9、叶建亮,“黑牡丹-天宁科技园策划研究——结构布局与开发时序专题”,企事业委托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1.7。

10、黄先海,“黑牡丹-天宁科技园策划研究——发展战略研究、商业模式研究”,企事业委托项目,项目起止时间 2011.2-2011.7。

学术成果

已 著作

- 1、《拍卖理论》，罗德明、奚锡灿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 月出版。
- 2、《跨国公司 R&D 国际化与中国自主创新》，肖文、林高榜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出版。
- 3、《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史晋川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年 2 月出版。

目 录

1. 蔡宏滨等：“Incentives, Equality and contract renegotiations: The evidence in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58, 156-189。
2. 李传忠：“Valuing urban accessibility and air quality in Sweden: A regional welfare analysis”, *Empirical Economics*, 2011, online since March 23 2011。
3. 李传忠：“Dynamic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large projects: The role of capital cost”, *Economics Letters*, 109 (2010) 128-130。
4. 李传忠：“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under regime shift uncertainty: a resilience pricing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 (2010) 707-719。
5. 王志凯：“Social security for China’s migrant worker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50 (2011), No. 1-2。
6. 王志凯：“Institutional Approach in China’s Local Development: The Cases Studie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Local Economies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7. 史晋川等：“中国省际工业新产品技术效率研究”，*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
8. 董雪兵等：“基于理性、效率与制度的法经济学研究——第八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11 年第 1 期。
9. 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
10. 史晋川等：“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 2011 年第 1 期。

11. 赵伟:“工业化—产业集聚与制度演化:浙江模式再思考”, 社会科学战线, 2011 年第 1 期。

12. 史晋川等:“非正式的第三方产品责任治理机制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2 期。

13. 金祥荣等:“银行监管、风险承担与公司价值”, 浙江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3 期。

14. 金祥荣等:“人类史上市场扩展的阶段、类型和机制——迈向统一的经济增长理论”, 社会科学战线, 2011 年第 2 期。

15. 陈凌等:“华人企业集团家族治理模式演进研究——以印尼哥伦比亚集团为例”, 东南亚研究, 2011 年第 3 期。

16. 朱希伟等:“经济集聚与区域协调”, 世界经济文汇, 2011 年第 3 期。

17. 王志凯:“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1 年 1 月第 24 卷第 1 期。

18. 赵伟:“通胀越‘界’进行时”, 中外管理, 2011 年第 1 期。

19. 赵伟等,“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与制造业集聚:机理与实证”, 经济学家, 2011 年第 2 期。

20. 赵伟等:“企业出口决策:‘被迫’还是‘自选择’——浙江与广东的经验比较”, 当代经济科学, 2011 年第 1 期。

21. 赵伟:“‘全球性通胀’是个伪说”, 大经贸, 2011 年第 1 期。

22. 赵伟:“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中国与印度的比较——后冷战以来绩效与分析框架”, 当代亚太, 2011 年第 1 期。

23. 赵伟:“中国式反垄断”,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3 期。

24. 赵伟:“走偏了的‘碳经济’”, 浙江经济, 2011 年第 4 期。

25. 赵伟等:“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与制造业集聚:机理与实证”, 经济学家, 2011 年第 2 期。

26. 赵伟:“碳排放推动新‘数字出官’”, 大经贸, 2011 年第 2 期。

27. 赵伟等:“制造业集聚、集聚经济与区域制造业发展——基于浙江与广东的比较分析”, 浙江学刊, 2011 年第 2 期。

28. 赵伟：“物价房价都很关键”，浙江经济，2011 年第 1 期。
29. 赵伟：“‘后危机’世界经济：集聚点威力”，浙江经济，2011 年第 2 期。
30. 赵伟：“财富替代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陷阱”，大经贸，2011 年第 3 期。
31. 赵伟：“通胀是否已席卷全球？”，中国经贸，2011 年第 3 期。

学术交流

举办和出席会议

史晋川教授参加“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迎来 100 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为科斯教授祝寿。CRPE 主任史晋川教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并提出了“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一说, 以下是史晋川教授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史晋川: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 首先我要对科斯教授表示非常诚挚的祝贺, 祝贺他百岁生日快乐!

我想就科斯教授对经济学演进的影响谈一些自己浅显的看法。从 19 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地位确立以来, 经济学是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尤其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机制问题。因此, 在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下,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组成部分是以财产制度为代表的制度, 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经济运行的机制或资源配置的机制。这两个

部分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面, 第一, 似乎可以相对比较清晰的分开来; 第二, 它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配置的机制运行部分, 而制度部分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摆在那, 相对的被忽视。科斯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我看来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向。第一, 我们可以发现, 可能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这两个部分没有像原来经济学这样可以比较清楚的把它们分开, 比如科斯教授就谈到过生产的制度结构, 表明这两个部分在很多时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很难比较清晰的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第二, 新古典经济学相应自然引出的结论告诉我们, 当一个经济社会系统出了问题以后,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下, 往往会在现存的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找各种各样发生问题的原因, 比如上世纪 20 年代大萧条之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实际上也就是在经济机制的宏观层面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 我们可以看到科斯及新制度经济学的东西引进的比较少, 而到十年以后就开始大量引进, 而且越来越热。这个问题我想也是有同样原因的。我们在对原来的计划经济做反思的时候, 人们开始反思的思维框架往往是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影响, 反思的是经济运行机制的部分。比如进行价格的双轨制的设计, 进行承包制度的设计等等, 也就是很多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东西考虑比较多, 这个当然也和兰格的理论及前苏联和东欧过来的经济改革理论传统有关系。后来人们发现仅仅讨论这部分问题是不足以解释中国改革和整个经济发展的, 因此开始大量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运行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周其仁教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为什么科斯经济学在中国能够这么大的影响, 我想这可能不仅是中国经济学家需要, 更多的是中国改革到了从机制反思到制度反思的理论需要, 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时代需要和时代呼唤。所以, 我想科斯经济学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背景。

最后, 我想说, 1993-1994 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 2008 年和 2010 年也非常有幸参加了两次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经济制度与发展的会议, 本人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受益者。我原来是研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1996 年我的理论研究重点转向法经济学研究, 也是受到科斯教授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同样我在国内做应用研究的时候, 例如温州模式, 台州现象和浙江经济发展的时候, 浙江

大学的研究团队做了大量的案例研究,这种案例研究在很多方面也是受到了科斯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大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感谢科斯教授。

汪炜教授在 2011 顺商新年峰会发表演讲

2011 年 1 月 11 日,由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协办的“2011 (第三届) 顺商新年峰会”在广东顺德隆重举行。顺德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和浙江省内源式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相同,顺德本土的民营企业家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的成功之路。当前,顺商的发展和浙商一样,面临转型升级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有一系列问题需要面对和破解。

长期以来,浙江大学与顺德的政府和企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浙大学者通过自身对浙江经济金融和民营企业的研究,为顺德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一系列学术支持和帮助。这次由顺商俱乐部主办的论坛同样得到了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和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本届新年峰会的主题是“金融路径与顺商资本的崛起”,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与顺德企业家共同探讨“顺商金融”发展的方式和路径。峰会由 AFR 执行院长、CRPE 副主任汪炜教授第一个发表演讲,题目是“PE 的资本逻辑”,汪炜教授在精辟阐述了 PE 将成为中国传统企业家向现代资本家转型的重要途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他对 PE 的三个层面理解:PE 是一种金融资本,PE 是一种创新资本,PE 是一种治理资本。汪炜教授的精彩演讲获得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们的热烈欢迎。随后,浙江华睿投资董事长宗佩民,瑞士银行(香港)执行董事、麦格理资本(香港)董事总经理郑宝川、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行长顾卫平等专家分别发表演讲。

金祥荣教授、汪炜教授应邀赴台参加“2011 中部财金学术联盟暨第八届金融市场发展研讨会”

2011 年 3 月 13 日至 18 日,由台湾证券交易所、台湾财务工程学会、中部

财金学术联盟和中正大学财金系联合主办, 淡江大学财金系所等多家单位协办的“2011 中部财金学术联盟暨第八届金融市场发展研讨会”在台湾省台中市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学者 400 余人参加了本届研讨会。CRPE 执行主任金祥荣教授、副主任汪炜教授等一行 6 人应邀赴台参会, 围绕“ECFA 签署后两岸金融新格局与商机、如何把握人民币升值转轨国际化商机、开拓两岸证券与期货市场合作”等专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在研讨会上, 金祥荣教授主持了题为“如何把握人民币转轨国际化之庞大商机”的专题座谈会并做主题发言, 其“中国需要正视以低所得国家推动高所得国家持有其货币之事实”的主要观点被台湾重要媒体之一的《旺报》在首要位置做了详细报道。汪炜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题为“两岸 VC/PE 的互动发展”的主题报告, 引起与会学者和两岸实务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会议期间, 代表团还与部分台湾高校金融专业系所深入接触, 并就相关学术合作的途径与方式进行了充分交流。代表团一行参访了中兴大学社科暨管理学院, 就两院历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做了深入研讨。此外, 代表团还参观了联胜光电和长泓能源科技两家高科技公司, 并与台湾宝硕财务科技公司就双方合作事宜作了深入探讨。



☞ 特色学术活动：CRPE “双周青年学者论坛”

☞ 第 135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3 月 18 日

报告题目：Split-Award Contracts with Investment

报告人：李建培 副教授（对外经贸大学）

☞ 第 136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3 月 25 日

报告题目：Government Structure and Military Coups

报告人：梁平汉 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 第 137 期

报告时间：2011 年 3 月 28 日

报告题目：Early Health Shocks, Parental Responses, and Child Outcomes

报告人：易君健（香港中文大学）

媒体传播

❁ 史晋川教授在“科斯与中国”论坛上接受搜狐财经独家专访



史晋川：到了对体制改革进行反思的阶段

搜狐财经：1993 年和 1994 年您在芝加哥大学学习，那时候您和科斯教授有过接触吗？

史晋川：没有，只是好像在一个什么演讲会议的场合看到过他。我在经济系，那时候经济系主任是歇尔利·罗森教授，他是做劳动经济学的，我受他邀请到芝

加哥大学去访问学者。我 7 月份去的，盛洪是 10 月份去的，我在经济系，他在法学院。

搜狐财经：您去芝加哥大学几年一直学经济？

史晋川：对。我研究生在复旦学的是西方经济学。

搜狐财经：您刚才讲话提到受科斯影响，回来之后开始学习新制度经济学，能不能具体讲一下他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致使作出这样一个转变？

史晋川：第一，一开始我是研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从 84 年复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后来博士也是这方面的研究，觉得差不多了，也有三本书写出来了，在这个领域当中可能研究了十几年之后，本身有点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去芝加哥大学后看了一些书，包括看了一些杂志，接触到新制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的制度框架，以及法律的运作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实际就是自己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做这方面的研究，看了很多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书。这些书看多了之后，科斯教授做的案例研究对我的影响比较深。我在 90 年代后期做温州模式研究，到后来做台州现象研究、浙江模式研究，我们那些书大量采用的是案例研究的方法。

搜狐财经：那时候您有转型的想法，正好接触了科斯教授新制度经济学，感兴趣就转过去了，这个转变过程当中科斯教授本人对您有什么推动作用？

史晋川：没有，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没有跟科斯教授直接接触过，我跟他直接接触的还是 2008 年。08 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30 年，科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了，那次会议比较多邀请了浙江的学者和企业家参加，科斯教授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和理论总结，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线的亲历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这是他强调的会议宗旨。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在那次会议上我跟科斯教授有一定的接触，跟张五常教授接触还是比较早，九几年就开始接触。

搜狐财经：您觉得张五常教授的学术跟科斯教授，现在很多人讲张五常教

授在某些方面跟科斯教授有一些分歧。

史晋川：在大的方向和总的原则方面还不是非常一致，他们都非常强调制度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他们都非常强调经济学的研究要用最基本的原理和道理来阐述这些经济现象，他们比较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而不是像张五常教授讲的玩水晶球预测，应该说在大的方向他们俩是非常一致，否则的话科斯教授也不会把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经济制度》看成是对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非常好的文本总结。

搜狐财经：您刚才上午讲话当中提到，我们现在的改革已经到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反思的阶段。

史晋川：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改革开放如果说前十年把很多讨论都是放在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上，后二十年的发展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实际上已经开始充分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发现很多经济运行机制实际上是在一个制度框架下才能非常有效构建起来。如果离开了经济制度这个大的框架，纯粹构建模仿性的构建经济运行机制的话，比如价格机制或者现代公司制，那就是缘木求鱼。当然作为过渡时期这些还是有它的历史贡献和地位在那里的，但是改革从第二个十年开始已经深化到这一步，我们应该不光光考虑经济运行的机制方面机制的构建，而是应该探讨它背后的制度因素，已经到了这一步。科斯经济学能够进入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深化体制改革阶段性进步和巨大的时代的需求。

搜狐财经：后面二十年这样过来.....

史晋川：如果现在开始进入第四个十年，已经从经济制度开始到非经济制度，我们还是在制度方层面做反思，但是这个制度层面作反思的话它的广度和深度都应该拓展。如果前面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匹配性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政治制度其它等等这些制度跟经济制度的匹配性问题。

搜狐财经：科斯的学说也好或者新制度经济学对于改革到了这个阶段最大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史晋川：制度是非常基础的，制度是一个社会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就像我们要有很快的交通速度就必须要有高铁必须要有高速公路等等这样一些基础设施,制度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非常重要的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构建好了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基础设施没构建好发展当中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

❁ 史晋川：中西部需要新经济增长极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1 月 13 日第 2 版报道,2010 年 12 月 11 日,新形势下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论坛在重庆工商大学召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将重庆及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重庆及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对加强该地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在题为“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的报告中介绍了“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浙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分析了重庆模式。他认为,重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仅靠“两江模式”是不行的,只有选择多种模式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发展。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元和从区域经济的视角引出了当前中国中、东、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他提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既不能走均衡发展,也不能走非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需要有新的经济增长极。

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共同主办。

❁ 浙大学者智慧 闪耀“学习读本”

我校史晋川教授受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局表扬

《浙江大学报》2011 年 1 月 21 日第 3 版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给浙江大学发来感谢函,表扬我校社会科学学部史晋川教授。在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重要著作《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中,史晋川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等合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良好的工作作风和较高的理论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所承担的《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章节,为《读本》的编写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国内顶级经济学家之一,史晋川教授在 2009 年入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2010 年又应邀参与了《读本》的编写。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对于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史晋川教授参与编写的《读本》,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鲜明的观点、透彻的说理、通俗的阐释,对有关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全面准确的回答,被认为是全体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辅助教材”。在史晋川具体负责的部分,他在讲清“怎样看待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提出要“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同时也要“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些阐释,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有理有据,让人信服,进一步深化了读者对“四个重大界限”的认识;同时,也得到了中宣部的充分认可。

成绩的取得,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近年来,我校的学者特别是史晋川教授所在的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多次参与了中宣部重大理论读物的编写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前期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也与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每年市场反应良好的《理论热点面对面》,史晋川教授也参与了其编写工作,去年还因此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另一方面,通过史晋川的牵头,以研究中心的团队为支撑,最终实现了《读本》相关部分的编写。

而这,也只是浙大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的一部分。浙大的学者一直在默默做着为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政策方针提供科学论证与理论阐述,提供正确舆论引导的重要工作。以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为例,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经济区的战略规划制订、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市及政府部门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咨询论证等,从提出建议到形成文本,再到最终成型,都有浙大学者

的智慧闪耀其中。这次获得表扬,也是浙大“顶天立地”式发展科研很自然的结果。对于“顶天立地”的科研理念,史晋川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顶天”不仅仅指高水平的理论研究,同样也包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咨询研究。敢于“顶天”,善于“立地”,这,或许正是浙大的科学研究在国内以及国际上具有越来越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吧。

面对成绩,史晋川教授很淡然。他说,其实学校更应该在体制机制上加以完善,对此类不计“业绩点”的研究给予更多的支持。营造良好的服务政府、服务公众的舆论氛围,在教师的业绩考评方面,也将此类咨询研究适度纳入,给予支持和引导。鼓励浙大的教师走向社会的大舞台去“闪耀智慧”。

(全篇转载《浙江大学报》)

史晋川：浙商转型升级如何质变

经历许多挫折与历练之后,站在“十一五”与“十二五”的界河,一向敢为人先的浙商也颇有些迟疑;未来五年,乃至十年、二十年,浙江经济走向何方?浙商究竟应该如何转型?

浙商经历了“黄金十年”,浙江 GDP 增速却连续 10 年下滑,区域经济存在资本、产业空心化苗头,正在面临挤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方阵的危险。

宗庆后刚刚荣升为胡润富豪榜“中国首富”,身价 800 亿。身为上海市、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却在宗庆后身上发现了“质变”的隐忧。

史晋川说:“学者应该保持独立的身份,发表独立的意见。作为学者应该在民营企业存在问题的时候,能够勇敢的指出来。”

在他看来,虽然宗庆后在企业经营上比较成功,但我对他作为企业家的评价持保留意见。从宗庆后的个人发展脉络来看,他在处理政府关系方面很老道,娃哈哈集团做到现在的规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可以“绑架”地方政府了。宗庆后的最大问题还不在于产品方面,而是在企业治理上。

娃哈哈不是一个典型的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企业,一旦宗庆后退出(退位),这个企业的发展走向如何,都值得思考,娃哈哈能否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企业长青都还是问题。

过去十年，精明的浙商失去了主动转型升级的机会，也错失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机会。1998 年至今浙江错失了三大机遇期：1998 年，国内消费有向国际消费转移的趋势，浙江经济没向产业高端提升；2003 年国内宏观调控，浙江产业资本外溢变为游资，彻底走上不归路；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部分传统产业外迁中西部，导致浙江经济增速全面落后。

面对新的“黄金十年”，浙商该如何应对，才能避免成为“失落的十年”。

史晋川教授认为，吉利李书福，在汽车领域大胆进行跨国经营，目前实现了收购澳大利亚 DSI 自动变速器公司以及沃尔沃轿车品牌，在自主品牌和洋品牌的结合方面已经走向国际化了。

正泰南存辉，在低压、高压电器方面成为国内的龙头企业后，现在又进入新能源领域，做光伏、太阳能，表现也很不错。

浪莎集团的翁荣弟尽管是做传统的袜子产业，但他从生产环节不断向设计、品牌和营销等价值端进行延伸和扩张，敢于叫板沃尔玛、提高供货价格，确立自己的品牌地位和营销网络，在与美国市场进行对接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浙商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质变”。

转型升级要“因企业而异”

浙商在转型升级道路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又该如何在新一轮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史晋川建议，转型升级要“因企业而异”。

浙商网：目前，浙江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浙商普遍想进入新产业、新领域，在这些领域浙商的投资应注意哪些问题？

史晋川：虽然国家非常鼓励新兴产业，但是浙商在进入这些新领域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尤其是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它们的产业链很长。比如在太阳能产业链的前端会涉及多晶硅，单晶硅的提炼、切片，太阳能电池。一方面这些产业链的前端许多是高能耗且带有污染，另一方面，很难在短时间获取前端的核心技术和设备。

这些产业链的后端是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浙商应该积极主动的把这部分产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重点，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浙商网：你觉得在“调结构，促转型”大环境下，现有的“温州模式”会出现怎样的转变？

史晋川：在最近的 7、8 年里，“温州模式”碰到了一些困惑，这些困惑在于温州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绝大部分产业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一些产业。

近年来温州市政府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引进一些生产要素与当地民营企业相结合来提升温州经济质量，加快转型升级。

温州除了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之外，还需要不断推进新兴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功能的齐全和创新可以使这个城市高端生产要素集聚，更多的企业可以实现自主创新、转型升级，从而为温州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浙商网：你觉得浙商的转型升级有哪些突破口？

史晋川：我认为浙商的转型升级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个是优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原来许多浙商从事第二产业，现在跨越到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做转型升级。例如浙江中南集团，原来从事建筑业为主，近几年成立了中南影视动漫集团，投身影视动漫，跨入了现代服务业。

第二种情况是企业从传统制造业跨入到新的制造业。例如正泰集团，原来是做低压电器，如今进入光伏产业。虽然还是在制造业，但是企业做了跨行业的转移，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制造业。

第三种是产品价值链的升级。对于浙商群体中的许多中小企业来讲，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做跨产业、跨行业的转型升级，这时就应该对产品价值链进行升级，在原有制造环节的基础上，向附加值更高的供应链两端做相应转型升级。

浙商网：您觉得在过去的 10 年当中，浙商的融资手段有了哪些转变和发展？

史晋川：浙商通过原始资本积累，再转变为产业资本的环节非常成功。但是，目前浙商面临进入新的产业领域，门槛比较高。如何将分散的中小产业资本通过新的融资渠道集聚成较大的金融资本，再反馈到这些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浙商就需要在原有的传统融资渠道上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包括上市、私募、股权投资等等。

民营企业自身要做好准备

尽管民营资本已经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国有垄断行业一直以来是民营企业的“禁地”。今年 5 月，国务院发文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让民营企业跃跃欲试。尽管“禁地”的一角已经打开，史晋川告诫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浙商网：国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垄断行业和国有资产，你是怎么评价的？

史晋川：我认为从长远角度看，在市场经济，国家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绝大部分投资领域都应该是公平的，所以国新 36 条出台给民营经济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它突破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制度障碍和产业进入壁垒。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的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就有所突破，像石油、化工、航空灯领域的准入门槛很高，所以民营经济还应在自身准备好的情况下用更好的方式进入。

浙商网：与 2000 年相比，在这十年中，浙江的经济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起到了哪些促进作用，未来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更加完善？

史晋川：过去十年，浙商依靠过去老百姓对吃、穿、用的基本需求，快速成长起来。但是随着国内的消费结构开始转变，汽车、电子通信、高等教育、旅游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迅速释放，绝大部分浙商没有对需求的变化做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是致力于市场结构调整，用国际市场需求来替代国内市场需求，使得出口大规模扩张。

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际市场的迅速拓展带动了新一轮的浙商成长，另一方面也为浙商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埋下了伏笔。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大幅下降，对整个浙商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之大。

未来，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浙商的发展重心应该转移到产业结构调整上来。作为政府，也应该为浙商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来推动浙商的转型升级。

浙商网：回顾你的学术生涯，你觉得学者在政治决策中应该发挥哪些作用？

史晋川：学者应该保持独立的身份，发表独立的意见。一方面，我们所提的各种意见只是供政府参考，如果我们时刻与政府步调一致，就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学者应该在民营企业存在问题的时候，能够勇敢的指出来。

浙商网：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台州市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民主政治

的探索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几年台州的民主事业有哪些进步？

史晋川：基层党委和政府组织民主恳谈会，来反映民声、民意，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民主恳谈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更重要的在于民主政治的改善和提升。应该更好的利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制度来反映民意和民情，它们具有法律保障。

未来十年房价不会降

为何中国的房价会如此之高？国家调控政策频出，能否遏制楼市上涨，高房价究竟何时才是尽头？从史晋川的解答中，你或许可以看到原委和未来。

浙商网：你认为现在的房价高吗？

史晋川：现在的房价应该是偏高。

浙商网：你赞成目前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吗？

史晋川：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房价在近几年大幅上涨，供给是一个原因，即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供应量有关。另一个是住房的需求，现在中国的需求来自四代人在短时期内集中对住房形成刚性需求。这种需求的集中释放，对房地产是有抬拉作用，尤其是形成投资性的需求后，价格上涨的更加快。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目的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在稳定房价的前提下，让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我非常赞成对房地产的调整。

第二，房地产它不仅具有一种商品属性，它还有一种基本必需品的属性。政府一方面在控制商品房价格，稳定它的价格；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逐渐把政策重心转移到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廉租房，保障这一块住宅的体系建设，因为这部分体系的建设可以满足更多中低收入者的需求。

浙商网：目前需求也是大量的在释放，你觉得这样下去会引发一些矛盾吗？

史晋川：中国现在是四代人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25-35 岁的人准备进入这个市场，35-55 岁是这个市场的主体，55 岁之后逐渐从这个市场退去，这才是合理的分布。

目前的住房需求，并不完全是投机性需求。即使在政策调控之下，许多新开楼盘还是刚性需求在释放。到 2020 以后，尤其是 2035 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老龄化开始加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会相对冷下去。

文/浙商网记者 张建军

（全文转载《浙商网络杂志》第一期）

🌸 CRPE 史晋川教授接受《解放日报》采访

温州“资本自由行”背后的真命题

●温州民间资本这些年以“鲶鱼”的形象，搅动了整个市场，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代表，它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识意义。如果仅仅从抑制民间资本无序流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没有理解这一金融创新政策出台的真正意义。

●为民间资本“泄洪”的背后，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温州一直是一个先行者。通过金融改革，如果能够把丰沛的民间资本引导好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转型发展都将产生示范意义。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宾：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支玲琳：规模庞大的温州民间资本的流向，一直牵动着各方关注。近日，随着《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的颁布，温州民资又将首尝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这些年来，以温州为代表的国内民间资本，似乎总也摆不掉“炒作”“投机”等负面形象。如今境外“资本自由行”的开放，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史晋川：这其实在意料之中。我现在受托正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温州区域性金融创新。除了温州个人境外投资的试点之外，今后可能还有一系列的举措将陆续推出，诸如温州地方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温州直接融资市场的建立健全（设立风投、产业基金），温州在利率市场化方面的率先改革，等等。目前所推出的“资本自由行”，只是先行先试的一个举措而已。

温州民间资本这些年以“鲶鱼”的形象，搅动了整个市场，成为中国民间资本的代表，它的一举一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识意义。因此，这次放开个人境外

直接投资会引发外界诸多关注和揣测，也在情理之中。但要知道，温州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验区，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桥头重镇，如果仅仅从抑制民间资本的无序流动、怎么让民间资本“不干坏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并没有理解这一金融创新政策出台的真正意义。

支玲琳：那么政策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史晋川：要解读中国的民营经济、民间资本，温州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通过梳理温州的经济发展、资本形态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中国民间经济发展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商业流通领域来形成资本原始积累。比如著名的桥头纽扣市场、“鸡毛换糖”、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领先，也是非常典型的。

第二阶段，通过商业流通领域完成原始积累后，将资本投入制造业：原本是卖纽扣的，现在去制造纽扣；原本是卖打火机的，现在去制造打火机，民间办厂如春潮涌动。这种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变，成功实现了资本转换，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第三阶段。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本身需要转型升级：要从传统制造业向国家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提升。这种转型升级，仅仅靠大量分散的中小产业资本单打独斗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弃实业而去，转向了市场投机。一来，扰乱了市场秩序；二来，也令实体经济失血。据我们估计，温州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投机性资本，大概有 6000 亿-8000 亿元。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有新的融资平台、融资方式，将这些小的资本积聚成规模金融资本，再反馈回产业领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无论是现在允许个人直接投资海外实业，还是接下来要推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要做的其实都是这样一件事：要让民间资本重归实业、回馈产业。

另一方面，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仅仅靠自己的企业家、现有的资源，实在力有未逮。但通过以民引外、中外合璧，就能使我们的民间资本和国外的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使新的

生产要素、新的产业升级途径,能够为我所用、所借鉴,使得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新的开放格局中,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我认为,为民间资本“泄洪”的背后,其实做的是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个大课题。

支玲琳: 尽管每人每年 2 亿美元的投资“上限”可谓尺度颇宽,但《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即只准投资实业,不准炒股炒楼,从中可见政策之苦心。但问题是,经济人讲的是实际,最终影响资本流向的是投资回报率。有句话说,“投资如虎、地产似猪、主营像牛”。已经被炒房、炒煤“宠坏”胃口的民间游资,如何才能吸引它们重回“慢牛”的实业领域呢?

史晋川: 对于那部分民间游资来说,尽管过去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规范、宏观调控力度的日益加大,风险正在不断累积。比如温州“炒煤团”,经历了山西当地煤炭企业重组的风暴后,损失不小。按照单矿不低于 90 万吨、集团不低于 300 万吨的产能标准,几乎没有一家温州资本投资的煤矿达到这个规模,所以温州民资将近 500 亿-600 亿元在山西的煤炭行业的投资,结果却成为被整顿、被整合、被兼并的对象。而在兼并过程中,在采矿权补偿、其他一些投资补偿方面也有一些分歧和意见。再如“炒房团”。过去温州资本在全国一二线城市分布非常广,但随着房产调控的风声日紧,房地产投资的风险正在累加。尤其是如果想获得暴利,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再看海外投机,温州“炒房团”在迪拜楼市被套 30 多亿元,付出的学费不能说不惨重。可见,无论是资源性的煤炭行业,还是金融地产行业,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游资所面临的限制和投机风险正越来越大。这一切都表明,民间资本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当然,对于这部分投机性较强的资本来说,单单靠允许海外直接投资,不可能完全扭转其中大部分资本的流向。而且,如果只是单纯的资本流出、单打独斗,其实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实际价值。只有把“走出去”和国内的金融改革,新的融资方式、融资平台搭建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政策的合力,把目前热衷于做短期投机的资本集聚到新的融资平台上,再反馈到产业上来。

要破题目前中国民间资本东奔西突、投机性强的问题,其实关键也就在这里。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温州一直是一个先行者。通过金融改革,如果能够把丰沛的民间资本引导好的话,那对于整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转型发展都将产生示

范意义。

【解放日报】2011 年 1 月 25 日第 13 版

❁ 史晋川教授接受路透社采访

英国路透社高级制作人及资深记者 Jane Lanhee Lee 和制作助理李爽于 3 月 4 日专程赴浙江大学,就温州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采访了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教授。史晋川教授就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发展的特点与存在问题,以及温州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回答了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据悉,路透社目前正在制作大型专题片《温州模式》,预计三月底该片将播出发行。

❁ 史晋川:中国怎样来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今年 2 月中旬,日本正式公布的 2010 年 GDP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的人均 GDP 还在 4000 美元左右,仍是一个“中等偏下收入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就使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均不足 300 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不可思议地从“贫穷陷阱”中走了出来。

但是,中国仍然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掉入陷阱的时间可能就是最近 5 年,有专家预言。

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各类要素成本,将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比较优势不断减少。中国继续上升的空间到底在哪里?

在下一个 30 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疑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壮大和稳定中产阶级

要跃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既保持增长,又要实现社会稳定,中国怎么来实现?

“壮大中产阶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说。政府需要拓宽社会的上升渠道,使得阶层之间的攀升有足够的空间;在法律和制度上,保护中产的利益,平衡和调节税收,保证中产阶级的稳定,提供更好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培育中产阶级的文化格局。

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纺锤形”,也就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为少数的两端,社会中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通常知识结构合理,行事理性,希望社会稳定,并有足够的消费欲望与生产力。令中国更多家庭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就能促进消费型社会的成长,促进内需,拉动经济,也能促进社会稳定。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中产占总人口的 12%,但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重偏低,并且劳动力份额占 GDP 份额也比国际标准低。中国纺锤形社会结构仍未形成。

史晋川说,壮大中产阶级,也是平衡社会分配的方法。如果中产阶级不足,也就意味着社会是金字塔的模型,这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社会不公的积怨,这必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基本因素。一旦 GDP 增幅放缓,或遭遇重大外部环境影响,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要克服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就需要重塑社会分配,推动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突破束缚创新的机制

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然而核心技术大都不在中国,技术性的进口国,永远受制。“没有高科技和核心技术,如何成为高收入国家?”史晋川反问。

中国要继续进步,就要转变为“技术创新国”。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它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来分担这些风险。实现创新还需要一个好的竞争环境,保证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

史晋川说,中国接下来必须突破束缚创新的机制。垄断和行政壁垒在中国仍有市场,它们只能促成封闭的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创新,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突破垄断限制。更需要一套综合的国家竞争政策框架,保证整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要保障创新,还需要重视教育和知识产权的投入。建设出色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为新企业融资更深入的金融系统,以及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史晋川认为,影响创新的,更多来自于僵化的体制。体制比什么都更需改革。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物业税(房地

产税) 的开征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助于减少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倾向。

需促成消费型社会

专家判断, 如果中国较长时期保持人均 GDP 年均 7%-8% 的增速, 那么到 2024 年左右, 我国就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目前投资性增长和以低端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使得经济发展的素质不高, 能源消耗大, 环境污染大, 表现为不可持续性。

经历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更明白, 保障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专家认为, 中国目前运行的经济模式, 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普通消费不足。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变化, 只能依靠投资驱动。

“要实现经济转型, 需促成消费型社会, 真正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促使公众消费无忧。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 合理安排和促成就业。”史晋川说。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正视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 这与目前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破解的困惑近乎一致。

需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未来, 城市化浪潮仍不可避免。

城市化在当下出现了被诟病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农民的利益没有在城市化中被体现与重视。农民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 没有感受到城市化带给他们的利益, 他们只提供了人口红利, 却没有获得应当的权益。”

如果进一步城市化, 却未能真正提升这部分人的利益, 城市化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然而也只有城市化才能大量解放农村人口, 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史晋川说, 化解城乡矛盾和缩小城乡经济矛盾, 提高作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收入, 才能真正提振内需。

世界看好中国

诸多新兴经济体实现从贫穷到中等收入的过程,一般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

但是随着经济逐步发展,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逐步变小。许多新兴经济体没能调整战略方向,导致衰落。经济增长缓慢,原有的社会矛盾激化,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创造者之一霍米·卡拉斯认为,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应该有很好的前景。

海外普遍分析,中国拥有的强大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政府效率极高。应变比一般新兴经济体迅速。十多亿人口的市场意味着,国际投资仍将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这保证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重要投资格局不会变化。

另一面,中国比其他经济体更早地看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5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是 8%左右。专家称,这是中国有意为之,旨在控制增长速度,为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腾挪空间。

有官员也表达了避开陷阱的信心。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关口,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闯过去!”

《都市快报》2011 年 3 月 9 日第 A05 版

史晋川教授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

由“三缘机制”向“法制机制”转变 ——访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史晋川教授结合浙商目前面临的转型升级要求,谈了他对新商业文明的想法。

他说,浙江原先具备的制造业优势正在慢慢弱化,因此,创新要求向两端延伸,往前端是研发和设计,往后端是品牌和营销。而一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力度不够,创新的收益就会外溢,企业的积极性就会受损。因此,倡导新商业文明,应该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但又超越制度层面,更深入到企业家的人心。

创新:结合金融资本的创新

企业家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认识到金融资本的重要性,对于浙商,史晋川教授说他更关心的是怎样将分散的产业资本汇聚到新的金融平台,然后再反馈到产业领域,从而实现转型升级。这个问题不改变,浙商要实现新产业形态改变就难了。

近年来,温商碰到了一些困惑,困惑在于温州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绝大部分产业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一些产业。史晋川教授说,除了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之外,还需要不断推进新兴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功能的齐全和创新可以使这个城市高端生产要素集聚,更多的企业可以实现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同时还要与新的融资平台结合起来。此外,尽管近年来,小额贷款、贷款担保公司相继出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金融改革步伐还要加大,金融创新活力还要加强,这直接影响到产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然后反馈到产业领域从而做成规模的转型升级。

诚信:由“三缘机制”向“法制机制”转变

从有商业活动以来,中国传统维系诚信的机制是“地缘、血缘、亲缘”三缘机制,利用民间口耳相传来维系。改革开放初期,靠的也是这种传统的机制,保障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而随着商业交往突破地域范畴后,三缘机制渐渐失去约束力,不诚信的现象由此而生。尤其是近年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电子商务迅速崛起,由于信息不对称,不诚信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史晋川教授说,在市场经济主导下,法治的诚信维系交往机制应该被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去建设。

史晋川教授介绍说,浙江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浙江省企业新产品创新涉及到知识产权侵权的达 67%,而最后通过法院解决的只有不到 5%。企业创新收益

外溢，被别人占有，自身收益减少，直接导致新产品研发生命周期缩短，也让企业的创新流于表面。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史晋川教授再三强调，商业活动人格化交易机制正在弱化，非人格化交易机制加强势在必行，这主要应该由国家在约束条件下的法治建设来完善，而不仅仅靠企业家以内省的方式来完成。

（全文转载《浙江日报》2010 年 3 月 25 日第 24 版）

（记者 王静 沙德安）

